

DOI:10.19970/j.cnki.ISSN 2096-9708.2022.04.002

云冈石窟中期洞窟建筑空间探讨

吴 娇^{1,2}

(1.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2.云冈研究院,山西大同 037007)

摘要:洞窟建筑空间变化是外来佛教汉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云冈石窟中期洞窟一改昙曜五窟的椭圆形、穹窿顶的布局形式,出现了前廊后室的仿木结构单体建筑形式,第6窟则完整呈现了地面寺院组群建筑,前塔后殿,回廊与殿堂围合形成封闭的寺院,中期洞窟形制从对单体建筑的模仿逐渐发展为对组群建筑的模仿。洞窟平面也出现前方后圆的独特布局,这种布局融合了云冈石窟早期的椭圆形平面与中期的方形平面,是石窟建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极大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云冈石窟;中期洞窟;建筑空间;佛教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K87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708(2022)04-0010-08

云冈石窟位于武州山南麓,又称“武州山石窟寺”,^{[1](卷7上《高祖纪上》,P151)}洞窟依平面布局、雕刻内容、造像风格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洞窟为椭圆形、穹窿顶的形制,中期洞窟为前后室、方形平顶,晚期洞窟形制基本延续中期方形、平顶的特点,只是洞窟规模缩小。三期造像风格的变化直观反映出石窟艺术改梵为夏的过程,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然而,洞窟建筑空间的变化在佛教汉化的过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石窟建筑和平面布局两方面对云冈石窟中期洞窟建筑空间的变化进行初步探讨。

一、石窟建筑

云冈石窟中期洞窟以双窟为主,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开凿顺序依次为第7、8窟、第9、10窟、第11-13窟、第1、2窟以及第5、6窟,中期洞窟形制开始效仿地面木构建筑的样式,并且从对单体建筑的模仿发展为对组群建筑的模仿。

(一)对单体建筑的模仿

云冈石窟中期洞窟形制为前后室、方形平顶(图1),通常我们将此类洞窟称为佛殿窟,是对地面殿堂建筑的模仿。其中第9、10窟与第12窟前室南壁各有2根列柱,除前部列柱外,列柱的上方还

存在仿木结构的屋顶。1972年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在第12窟列柱上方清理出石雕庑殿式屋顶,列柱承托着屋顶,柱头雕栌斗、皿板、阑额等,推测洞窟开凿之初,雕刻有石质仿木结构建筑。^{[2](P199)}(图2)虽然第9、10窟崖面上方向内凹入,上部立壁被削平,屋顶形制被破坏,但是,从老照片上残损的柱头和大斗上的外壁崖面来看,在第10窟明间斗拱的补间铺作部位不仅保留着部分人字拱残痕(图3),而且两窟上部残存屋顶的檐下明显地保留着拱眼壁,两窟上也应存在仿木构屋顶。^{[3](P4)}因此,第9、10窟和第12窟整体形成前廊后室的布局,是地面单体建筑在石窟中的再现,前室由廊柱支撑的空间是单体建筑的前部回廊。

这种前廊后室的结构源于北魏地面建筑,虽北朝实体建筑无存,但北魏墓葬中出土的仿木结构石椁以及相关的建筑遗存中均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此类建筑。北魏平城考古发掘出土的前廊后室的仿木结构建筑有尉迟定州墓石椁,^[4]宋绍祖墓石椁,^[5]智家堡北魏吕续浮雕彩绘石椁以及一些墓葬出土的木堂。出土仿木结构石椁的墓葬多为有纪年的等级较高的墓葬,墓主身份相对明确。2010年发掘的北魏尉迟定州墓在石椁封门石上所刻的“太岁在丁酉二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为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457

收稿日期: 2022-06-14

基金项目: 山西省文物局2022年文物科技项目“云冈石窟第3窟营造计划及窟前建筑研究”(2022KT29)

作者简介: 吴娇(1988-),女,山西文水人,在读博士,文博馆员,研究方向:北朝与石窟寺考古。

年)。①2000年宋绍祖墓墓铭砖阴刻“大代太和元年岁次丁巳幽州刺史敦煌公敦煌郡宋绍祖之柩”,太和元年即477年。2021年发掘的智家堡北魏吕续浮雕彩绘石椁墓,不仅是大同市目前唯一的一座浮雕彩绘带前廊仿木石椁墓,也是目前发现纪年最早(456年)的仿木结构石椁,明间西廊柱正面竖刻两列铭文,为“惟大代太安二年岁次丙申正月丁亥朔廿三日己酉石文口江将军扶风太守槐里界雍州扶风郡槐里县民吕续石屋一区”。此外,2017年大同市考古所发现的太和元年(477年)贾宝墓,墓葬坐北朝南,墓室中间置单间木堂,发掘者认为该木堂亦为前廊后室的结构。^[6]前廊后室的木堂形式还见于大同七里村北魏墓M1^[7]以及二电厂北魏墓M31。^[8]就建筑

形制而言,时代较早的尉迟定州墓石椁,廊柱柱头上直接放置一斗三升的铺作,梁头搭在明间铺作之上,斗拱上承托挑檐枋(图4),构架的稳定性较差。宋绍祖墓石椁建筑结构相对成熟,廊柱上承阑额,柱头设一斗三升拱,补间人字拱,梁头嵌入铺作斗与升之间,这种仿木结构的形式与云冈石窟中期第9、10窟壁面上屋形龕的表现形式契合度最高(图5、图6),应是北魏太和年间流行的建筑式样。廊柱的形式还见于云冈石窟第2窟中心塔柱的第二层与第三层仿木构屋檐的下方,廊柱位于塔身四角,屋檐下方为一斗三升拱和人字拱,斗拱中央阴刻的长方形结构表现挑出的梁头。甘肃高台县地埂坡一号晋墓中南壁及顶部用原生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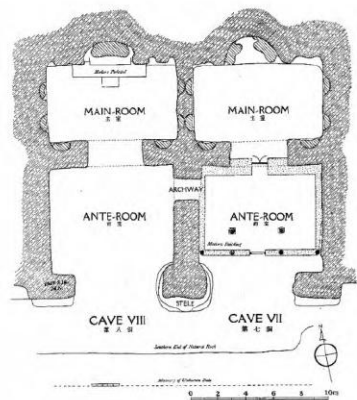


图1-1 第7、8窟平面图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
第4卷,第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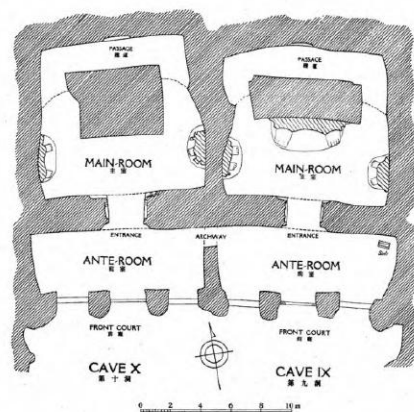


图1-2 第9、10窟平面图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
第6卷,第14页)

图1 云冈石窟中期洞窟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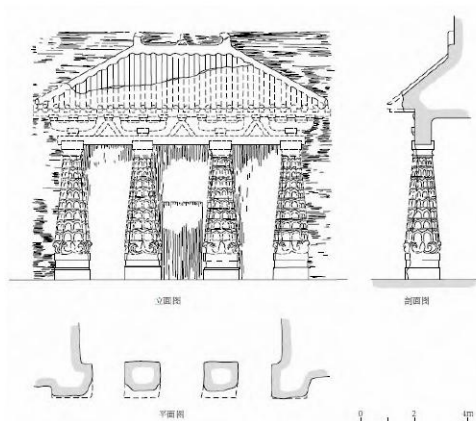


图2 第12窟前室仿木结构建筑复原图
(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云冈石窟》,
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20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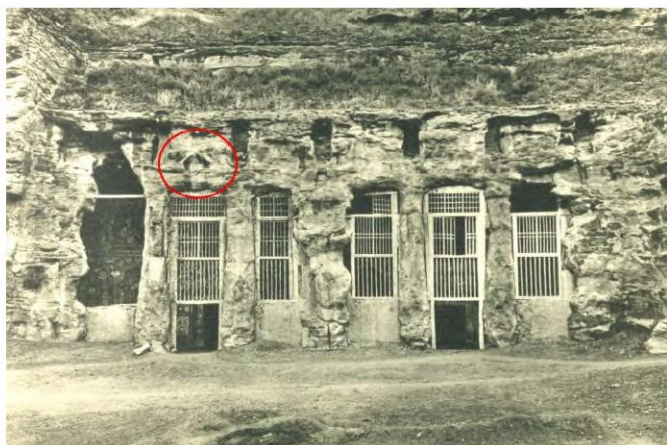


图3 第10窟补间铺作人字拱残痕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6卷图版,第2页)

①《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和《北魏尉迟定州墓石椁封门石铭文》将墓主判定为尉迟定州,郝军军《北魏尉迟定州墓墓主身份再考》(《文物》2014年第12期)认为这一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土雕出了仿木结构的梁架,其梁头直接置于大斗之上。^[9](图7)由此可见,云冈石窟中期洞窟前廊后室的仿木结构建筑是相对成熟的魏晋南北朝木结构建筑样式。

此外,北魏发掘的建筑遗迹也有前廊后室的结构,2009-2010年云冈石窟山顶北魏佛教寺院遗址发掘的房屋遗迹,为地面起夯土墙的建筑,在北排房前部1.8-2m的位置发掘出土12个“一”字排开柱础,由此确定北房

为前廊后室的土木混合结构。^[10](图8)前后均有廊的房屋在我国出现较早,陕西岐山扶风凤雏西周遗址正中的堂即为前后有廊的建筑,^{[11](P20)}但仅出现前廊的建筑,不见于汉代画像石及出土的石室,如山东肥城先孝堂山墓祠、朱鲔石室。东晋高台县地埂台仿木结构墓室亦未采取前廊后室的结构,平城地区出土的大部分北魏石椁也不见前廊,如大同智家堡石椁,^[12]大同云波路M10石椁^[13]以及洛阳出土的北魏宁懋石室(527年)



图4 尉迟定州墓出土石椁
(拍摄于大同市博物馆)



图5 宋绍祖墓石椁
(刘俊喜《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文物出版社,2008年,彩版五一)



图6 云冈石窟第12窟前室东壁屋形龕
(《云冈石窟全集》卷10,第1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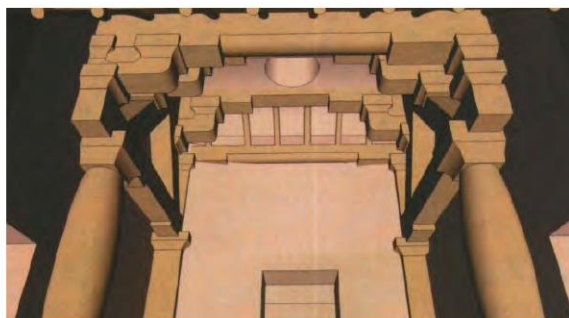


图7 甘肃高台县地埂坡一号晋墓仿木结构
(《甘肃高台县地埂坡晋墓发掘简报》,第3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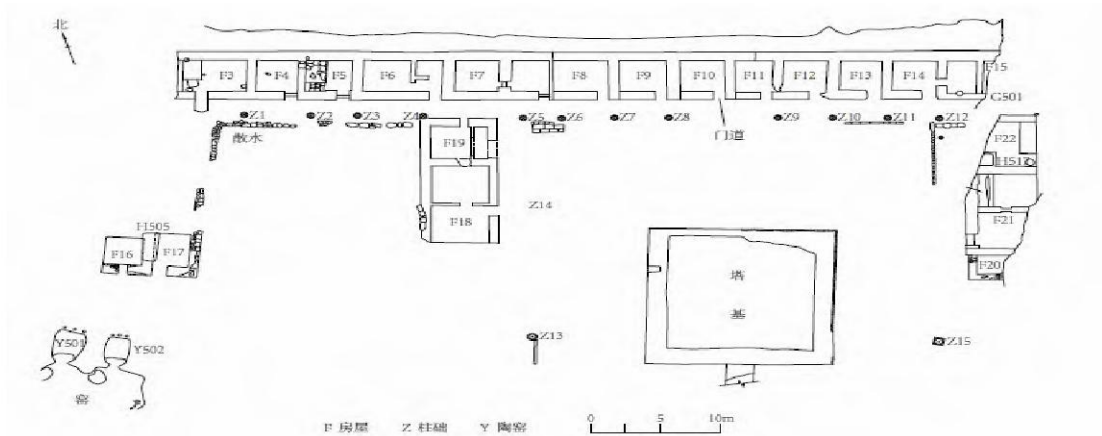


图8 2009-2010年云冈石窟山顶北魏佛教寺院遗址发掘的房屋遗迹
(云冈研究院等《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537页)

(图9、图10)。北魏前廊后室的建筑大多可能为等级较高的建筑,关于前廊后室建筑的起源,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前廊是在木结构发展不成熟的条件下出现的,主要表现在对斗拱的运用。在前廊后室的建筑中,斗拱用于外檐支撑出檐的重量,建筑主体由夯土墙承重,在北朝单体建筑完成由土木混合结构向全木架结构转变,^{[14](P102-141)}到隋唐时期,斗拱逐渐用于构架的节点上,夯土墙的承重作用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室内柱网结构不断完善,前廊的部分逐渐纳入室内空间,使得室内空间不断扩大,甚至在辽金时期出现了移柱减柱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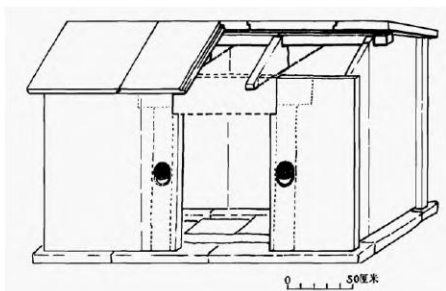


图9 大同智家堡出土石椁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第41页)



图10 大同云波路M10出土石椁
(《山西大同云波路北魏墓(M10)发掘简报》,第6页)
(二)对组群建筑的模仿

云冈石窟中期从第1、2窟开始,洞窟逐渐出现对组群建筑的模仿,呈现出前塔后殿的布局。《魏书》记东汉明帝遣蔡愔使天竺,愔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弟子收奉舍利,“置之宝瓶,……建宫宇,谓为塔。塔亦胡言,犹宗庙也,故世称塔庙……”^{[1](卷114《释老志》, P3023)}文献中多有建塔即建寺的记载,所以洞窟中出现佛塔本来就是对地面寺院的模仿,对塔庙的模仿最早见于5世纪前期北凉天梯山石窟。云冈石窟第11窟未按原计划实施,壁画龕像缺乏统一、规范的布局,但窟内的中心塔柱是云冈石窟出现最早的塔柱,该窟对地面佛寺的模仿已初露端倪,塔庙以塔为中心的建置,是东汉以来的佛寺布局。4世纪以来,南北方的寺院布局除延续以塔为中心的旧制,开始扩大寺院建置,塔后始立

殿堂。北方兴建殿堂,见于《魏书》“天兴元年(398年)……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闍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1](卷114《释老志》, P3030)}《律相感通传》明确塔、殿的方位为前塔后殿。北魏时期前塔后殿的寺院遗址见于洛阳永宁寺以及固阳北圜圉古城发现的佛教寺院遗址。云冈石窟中期稍晚的第1、2窟与第6窟塔庙窟全面地表现了当时地面流行的寺院布局,窟内设仿木结构楼阁式佛塔,塔的北面还出现了模仿寺院佛殿的大型龕像(图11)。佛龕均采用主次分明的三间式盂型龕,尤其是第6窟北壁盂型龕,不仅模仿早期昙曜五窟近椭圆形的布局,造像题材也选取昙曜五窟流行的三世佛的题材,宿白先生在《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一文中明确提到,“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昙曜五窟内皆只奉佛像,是我国现存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五座佛殿类型的石窟,^{[15](P296)}佛殿与佛塔的组合在第在云冈石窟中期较晚阶段首次出现。

除前塔后殿外,云冈石窟第6窟完整再现了地面寺院建筑布局,在洞窟东、西、南三壁下层出现了回廊,廊下为成排供养人行列(图12),回廊与殿堂围合形成封闭的寺院,低矮的回廊衬托出佛殿的高大和佛塔的壮阔,构成主次分明的建筑外观(图13)。院落使用回廊的形式在商周建筑中已经存在,如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殿堂院,汉代画像石上回廊的形制更加清晰,汉代高级建筑的庭院以门与回廊相配合(图14),这种方式到两晋南北朝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麦积山第4窟平基内北周时期壁画中佛殿四周亦绕以回廊,回廊外侧为夯土筑成(图15)。百济时代定林寺在中门、讲堂址两侧有宽5.2m的四周回廊基址。唐代《戒坛图经》所示律宗寺院正殿左右翼以回廊,再折而向前,形成四合院,建筑主次分明,高低错落。考古发掘的寺院遗址中,北魏洛阳永宁寺、长安青龙寺遗址西部早期寺院均为前塔后殿,四周绕廊庑的形制。

此外,对组群建筑的模仿,还体现在云冈石窟中期较晚及晚期出现的窟前立双塔的布局。文献中关于双塔的记载见于《高僧传》卷13《竺慧达传》,文中记载简文帝(371-372年在位)造长干寺双塔,《南齐书·良政·虞愿传》记载宋明帝(465-472年在位)于湘宫寺建五层两刹。东西对峙的双塔见于《历代名画记》卷5东晋司马睿时:“镇军谢尚于武昌昌乐寺造东塔,戴若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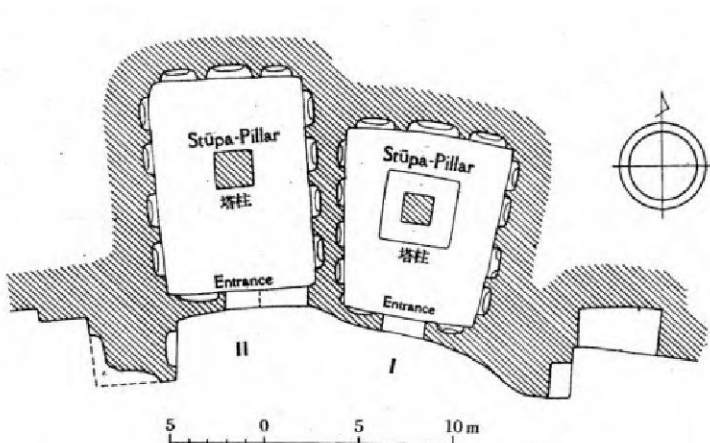


图 11-1 第 1、2窟平面图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 1 卷,第 1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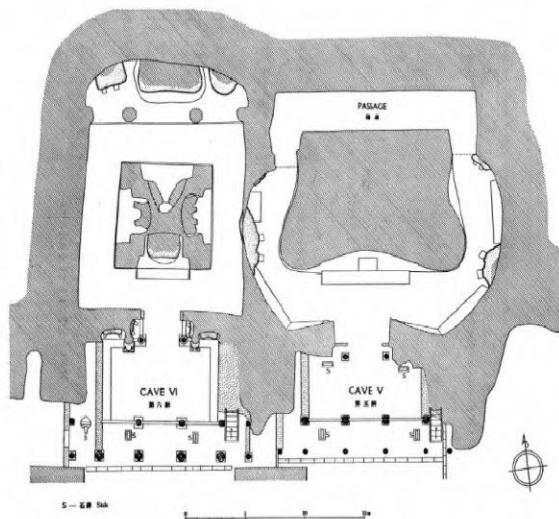


图 11-2 第 5、6窟平面图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 2 卷,第 8 页)

图 11 云冈石窟模仿前塔后殿的洞窟平面布局



图 12 第 6窟东壁下层回廊及廊下为成排供养人
(《云冈石窟全集》卷 4,第 11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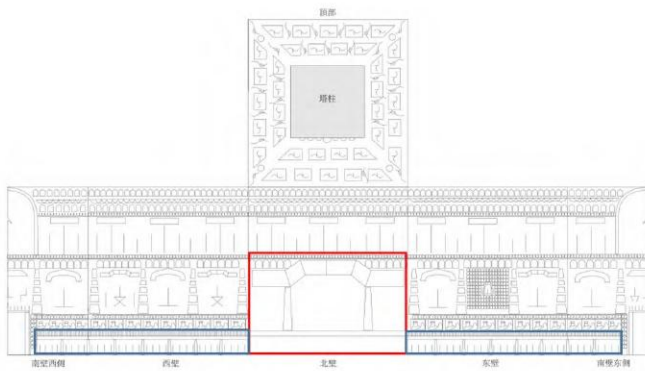


图 13 第 6窟佛殿与回廊
(《云冈石窟全集》卷 3,第 2 页)



图 14 四川汉代画像砖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 51 页)



图 15 麦积山第 4窟平棊内壁画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2013 年,图 236)

造西塔”。^{[16](卷5.P110)}云冈石窟保存较好的窟前立双塔的洞窟当属第3窟,第3窟是云冈石窟规模最大的洞窟,但因各种原因开凿中途停工,使得第3窟主室前面形成了一个东西长约50m、南北宽约7.5m的平台,平台上方东西两侧各雕一座单体仿木结构楼阁式佛塔,现平台之上保留三层塔身,且在塔身与平台交接之处雕出第四层塔檐(图16)。此外,在一些附属洞窟中窟门两侧也有浮雕双塔的形制。

云冈石窟中期洞窟是外来佛教逐步汉化的阶段,洞窟建筑一改昙曜五窟的布局,开始模仿地面建筑样式,作为皇家工程,石窟选取了北魏等级较高的前廊后室的建筑样式。第1、2窟,第5、6窟对地面建筑的模仿更加深入,将地面寺院组群建筑雕刻在洞窟之内,第3窟窟前双塔的形式也是对不同的寺院建置的模仿与尝试。洞窟之中出现汉化后的佛教寺院雕刻,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但石窟对寺院组群建筑模仿,在云冈之后的石窟雕刻中并没有广泛流行,这与寺院布局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东晋之后,寺院的建置不断扩大,除佛塔、殿堂之外,出现了讲堂、禅房、僧房等不同类型的建筑,这些建筑多采取纵深排列,这就大大增加了石窟雕刻的难度,故北魏之后仅对单体建筑前廊后室的模仿得以延续,如北齐天龙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等。

二、平面布局

昙曜五窟是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5个洞窟,洞窟均为穹窿顶,平面呈椭圆形(图17)。关于此类洞窟形制,学界公认与拓跋鲜卑源于北方少数民族有关,其形制模仿鲜卑族毡帐样式,^[17]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受到了印度本土石窟形制的直接影响,是切除了穹窿形的前半部的形态。^[18]但无论如何早期椭圆形的洞窟平面非传统汉式建筑的表现。

中期洞窟的平面布局普遍为方形,个别为椭圆形,洞窟平面存在从横长方形向方形的变化,平面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后室、前廊后室、前塔后殿均是对地面建筑不同程度的模仿,但都构成了纵深排布结构(图1、图11)。窟内建筑纵深排布表现了我国古代建筑布局特点,这种布局是我国古代建筑中最常见、使用最广泛的布局形式,最早见于商代宫殿遗址,西汉长安城外的礼制建筑即“沿着纵轴线组织纵深建筑群,自成一种体系,不但见于当时的陵墓,而且影响唐宋陵墓、北魏某些佛寺与后来各代坛庙建筑的平面布局。”^{[19](P42-44)}

中期洞窟中,第6窟的平面布局最具特色。第5、6窟的雕凿时间约在孝文帝都平城后期,^{[20](P83)}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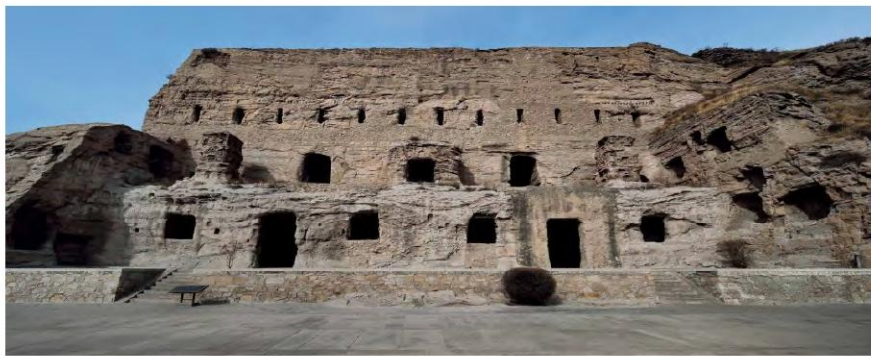


图16 云冈石窟第3窟外景
(《云冈石窟全集》卷1,第16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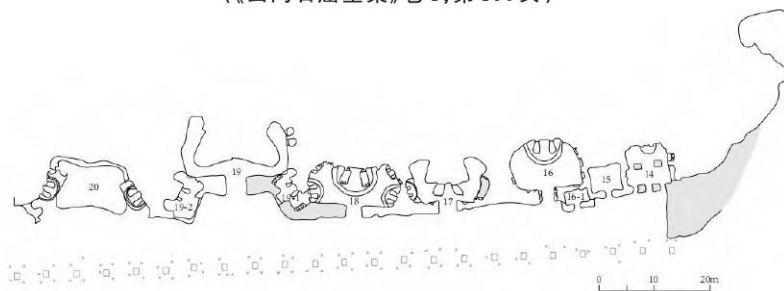


图17 昙曜五窟的平面图
(《云冈石窟全集》卷13,第2页)

云冈石窟中期最晚的一组双窟,但两窟形制略有差异,第5窟为椭圆形、穹窿顶洞窟,第6窟为中心塔柱窟,其中第6窟雕刻主题鲜明,壁面层次划分清晰,上部空间为表现法华盛会的佛国圣境,下部为世俗寺院的再现。值得一提的是,第6窟北壁通壁盂型龕,龕面宽11.5m,进深3.8m,龕内空间较大,平面布局呈现出近椭圆形,椭圆形的平面布局见于云冈石窟早期的昙曜五窟、中期第13窟及第5窟。此外,第6窟北壁盂型龕内的造像内容也与大像窟的相同,为早期流行的三世佛的题材,只是造像布局的延展性变强,二胁侍佛与主佛向并列布局发展。椭圆形的佛龕平面加之前部方形平面使得第6窟形成独特结构布局,这种布局融合了云冈石窟早期的椭圆形平面与中期流行的方形平面,开创了前方后圆、纵深排布的新的洞窟布局类型^①(图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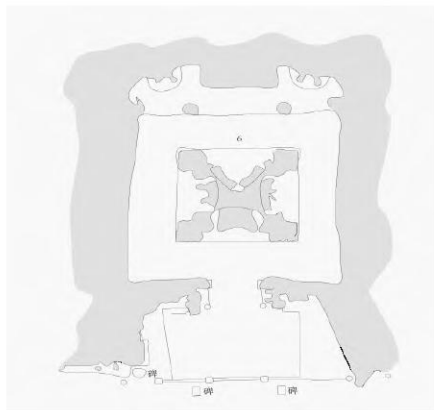


图18-1 第6窟平面图
(《云冈石窟全集》卷13,第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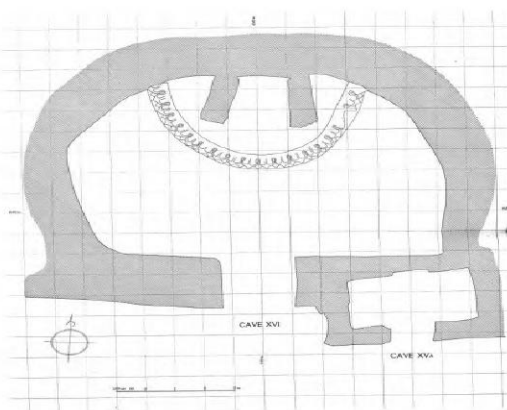


图18-2 第16窟平面图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11卷,第2页)

图18 云冈石窟前方后圆的平面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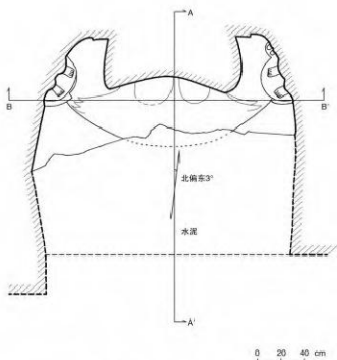


图19 云冈石窟第11-8窟平面图
(吴娇、吴洁测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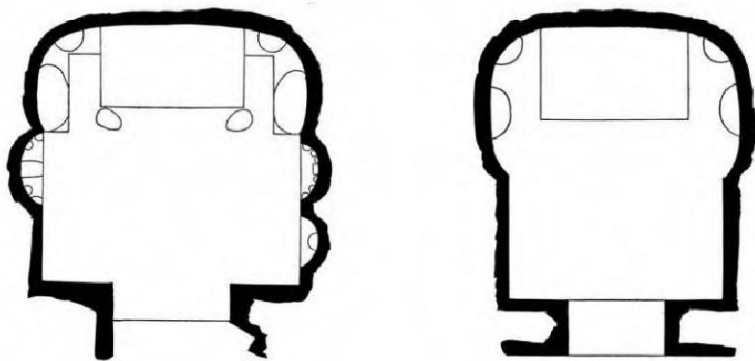


图20 龙门石窟宾阳南洞与北洞平面图
(《中国石窟寺研究》,第182页)

^① 这种前方后圆的布局形式在第16窟亦有所表现,第16窟虽为昙曜五窟之一,但窟内主尊造像着改制后的袈衣博带式佛衣。2022年佛教考古与石窟寺专题研修班进行洞窟测绘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宋瑞博士发现,第16窟主尊与洞窟前部空间有明显的界限划分,故第16窟的平面布局与第6窟有一定的相似性。

结语

洞窟建筑空间的变化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北魏时期地面建筑的样式逐渐影响到洞窟建筑的表现形式。云冈石窟中期洞窟首先选择了前廊后室的仿木结构建筑,较晚阶段洞窟则完整呈现了地

面寺院布局,洞窟形制从对单体建筑的模仿发展为对组群建筑的模仿,平面布局则融合了云冈石窟早期的椭圆形平面与中期流行的方形平面,出现前方后圆、纵深排布的独特布局,进一步加速了石窟建筑的汉化步伐。

参考文献:

- [1] (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姜怀英,员海瑞,解廷凡.云冈石窟新发现的几处建筑遗址[A].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3] 张焯主编.云冈石窟全集(第7卷)[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9.
- [4]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1(12):4-12.
- [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1(07):19-39.
- [6]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北魏贾宝墓发掘简报[J].文物,2021(06):23-37.
- [7]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2006(10):25-49.
- [8]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二电厂北魏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2019(08):15-37.
- [9] 甘肃省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甘肃高台地坡坡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8(09):29-39.
- [10] 云冈石窟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J].考古,2016(04):533-562.
- [11] 宿白.中国古建筑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12] 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J].文物,2001(07):40-51.
- [13]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云波路北魏墓(M10)发掘简报[J].文物,2017(11):4-21.
- [14] 傅斯年.两晋南北朝时期木结构建筑的发展[A].傅斯年建筑史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 [15] 宿白.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 [16]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 [17] 杨泓.从穹庐到殿堂——漫谈云冈石窟洞窟形制变迁和有关问题[J].文物,2021(08):62-80.
- [18] 郭静娜,韦正.云冈昙曜五窟洞窟形制中的印度因素与相关问题研究[J].敦煌研究,2020(04):38-43.
- [19] 刘敦楨.中国古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 [20]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A].中国石窟寺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21] (日)熊板聪美著,王雁卿,刘军森译.关于云冈石窟第11、12、13窟外壁龕的初步研究[J].云冈石窟研究院院刊(总第三期),2015:165.

(责任编辑 张月琴)

An Exploration of the Building Space in Mid-period Yungang Grottoes

WU Jiao^{1,2}

(1.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2. Yungang Academy, Datong Shanxi, 037007)

Abstract: The change of cave building space is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Buddhism. In the mid-period Yungang Grottoes, the layout of the oval and dome roof of Tanyao Five Grottoes was changed, and a single wood-like structure was built in the front corridor and back room. Cave 6 completely presents the ground temple group buildings, the front tower and back hall, and the cloister and hall form a closed temple. In the middle period, the cave shape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the imitation of single buildings to the imitation of group buildings. The grotto plane also has a unique layout of front and back circles. This layout combines the oval plane in the early period and the square plane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Yungang Grottoes. It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grotto architecture to a certain stage, which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the localization of Buddhism in China.

Key words: Yungang Grottoes; mid-period grottoes; building space; localization of Buddhism in China